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

李佳豪 2019200895

1.引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黑天鹅”席卷全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冲击。截止2020年7月13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接近130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56万例，波及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1]](#footnote-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预测2020年全球GDP预计下降3%。[[2]](#footnote-2)然而，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超过预期，IMF认为世界经济的表现将会比预期更加糟糕，并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20年全球GDP的预测再次降低1.9个百分点至-4.9%，[[3]](#footnote-3)此次衰退将比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的衰退更为严重，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生活产生和极大的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和消费受到重创，部分工业生产不得不因封锁暂停，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几乎停摆。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9.8%，第一产业同比下降3.2%，第二产业同比下降9.6%，第三产业同比下降5.2%。

虽然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且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面对后疫情世界，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积极有为，以保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文献综述

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必须通过实行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被高鸿业（1996）表述为政府为了促进整体经济福利、改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对宏观经济领域进行的有意识干预，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争议。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主义基于乘数效应、菲利普斯曲线和价格刚性等假设，认为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有效工具，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调整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而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理性预期效应等假设，认为财政政策不仅无法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甚至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不主张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政策、在公开市场进行大规模买卖、变动法定准备金率可以有效改变流动在市场中的货币量，进而影响投资来改变收入；但许多经济学家也指出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调整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需要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为前提、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国际货币流动影响等局限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实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其中，西安交通大学的王新霞等（2009）运用VAR模型，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十余年间即1999-2008年为观测期的季度数据，分别构建了VAR-GDP模型与VAR-CPI模型，并使用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最终得出了下述三个结论。第一，较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够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渠道有效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的效果有限；第二，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相较货币政策手段较为温和；第三，控制狭义货币供给和信贷对维持我国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与王新霞的研究相似，刘贵生等（2013）也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不同之处在于其使用的是从1996年至2012年的数据，时间跨度更长，结论更有说服力。刘贵生的研究得出了五个主要结论：第一，分析财政政策效果时不能忽视货币政策，否则会得出错误甚至相反的结论；第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第三，货币政策相比于财政政策能够更有效果地调控价格；第四，虽然从整体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明显的部分挤出效应；第五，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应该高度重视供给因素的影响，无论是GDP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都会受到技术增长、制度变革等供给因素的影响。

李艳军与华民（2018）认为，自1994年财政集权化改革之后，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开始从分散化向集中化演变，并使用HP滤波的方法得出中国的财政-货币集中化改革有效地改善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波动性，进而降低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李峰森（2010）的研究结论与上述结论相吻合：财政政策方面，1994年中国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约为3.32%，随后波动上升，在2008年的比例达到5.24%；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波动较大，部分年份低至1.14%，也有很多年份超过10%。同时，利用IS-LM模型，李峰森得出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税收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即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的研究还证明，由于投资的利率敏感度大于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中国的货币政策乘数大于财政政策，但这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好，因为政策变量也是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中国政府果断的政策实施再次证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孙立新（2016）通过构建基于开放经济的DSGE-VAR模型，得出了2007-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是及时有效的，如果没有那些刺激政策，中国的真实产出在2009年会下降5%，同时出口也会有大幅下降。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对中国的经济有推动作用，尽管有时这些政策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体的影响是积极的。

3.疫情影响与政策目标

在全球经济减速与中美贸易战的旧挑战与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新冲击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经济正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需求方面：投资活动显著收缩。从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数据截止至2020年5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连续4个月同比负增长，证明即使到5月疫情基本结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仍未恢复正常。其中2020年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滑24.5%，3、4月同比下滑仍超过10%。[[4]](#footnote-4)消费受到严重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跌3.9%，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下跌12.5%，表明居民消费倾向显著降低。[[5]](#footnote-5)对外贸易方面，出口和进口增速大幅下跌，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下跌17.2%、4%。同时中国总体贸易差额从顺差转为逆差，达71亿美元。[[6]](#footnote-6)

产出方面：受疫情负面冲击、企业复产复工延迟、交通物流受阻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1月至5月工业呈明显下滑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8.4%、4.9%、2.8%，仍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制造业PMI在1-2月仅35.7%，是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服务业方面，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滑13.0%、-11.7%、-9.9%、-7.7%，恢复速度慢于制造业。非制造业PMI在1-2月仅29.6%，同样是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7]](#footnote-7)

价格指数方面，CPI与PPI走势分化：CPI在1-2月涨幅较大，分别达5.2%与5.4%，在3月后回落，在2.5%左右波动；PPI在1-2月同比下降0.5%，并持续走低，在5月同比下滑5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同时，核心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与整体CPI走势分化，1-2月月，核心CPI同比涨幅分别为1.5%和1%，处于历史低位且呈下行态势。CPI与PPI“剪刀差”走阔、核心CPI低位运行，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需求疲软。

鉴于以上形势，参考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聚焦于以下目标：第一，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第二，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第三，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第四，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第五，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第六，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第七，防控重大金融风险；第八，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第九，全年不设GDP增速目标，集中精力抓“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调控政策与预期效果

4.1财政政策

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保障作用，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加大调节力度。

第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疫情冲击的特殊情况下，财政方面可以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同时在政府部门缩减开支，扩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短期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例。要确保满足公共卫生、复工复产、扶贫脱贫等重点领域的支出需要。国际上，为了应对疫情冲击，美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财政支持达到了GDP的10%，而我国的财政支持不到5%，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在疫情防控、恢复经济、稳定市场方面作用直接、效果迅速，能够有效在短期提振经济。

第二，要进一步做好减税降费工作。政府部门可以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如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中的企业以及从业人员推出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措施。如降低或推迟上缴个人所得税、养老保险费、减免部分水电气费等。

第三，要增加对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的转移支付。在疫情中，许多企业暂停发放工资、个体经营者也无法开业，导致许多家庭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财政可以层架对失业、贫困、孤寡老人、残疾人、暂无收入者等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同时，国家也应增加对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线下私营教育等行业进行适度补贴，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租金、薪酬方面压力，稳住市场主体。

第四，政府可以发挥其融资担保功能，进一步扩大政府担保贷款的范围和规模，降低贷款门槛、扩大贷款支持群体；同时提升申报贷款便利性，简化流程手续，缩短审批时间，使中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能够普遍地、及时地收益。政府部门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政府担保贷款的激励机制，对不裁员、不降薪、积极复工复产的中小微企业给予担保费率、贷款偿还方面优惠，避免大范围降薪裁员出现。

4.2货币政策

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金融支持作用，货币政策应保持灵活适度，保证经济正常发展。

第一，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可以通过加大调降MLF利率幅度，引导LPR利率下行，并进一步发挥LPR的作用，推动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与此同时，或可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提供空间。同时也需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货币政策可以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诸如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专项支持政策。

第二，要提升商业银行信贷的投放意愿与能力。疫情蔓延全球后，美、英、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实行放松杠杆规则、下调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和资本充足率要求、暂停银行业压力测试等做法。中国央行可以部分学习上述举措，健全激励相容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信贷投放。

第三，货币政策应该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实施，不能重蹈2007-2008年金融危机时“大水漫灌”的覆辙。在短期提振市场预期、中期托底经济增长之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框架改革有望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快筹备，在疫情平息后提速接力。尤其是要着力打通“利率并轨”的“最后一公里”，提升银行体系的风险定价能力，优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借贷的资本监管要求。

4.3坚持“房住不炒”

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方针，注重提高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和差异化，使得在帮助房地产企业度过疫情的同时不刺激房地产行业。坚持限购、限贷政策，防止各类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加强对各类地产金融产品的监控，对部分地区重燃的“炒房热”进行坚决打击。政府既不能把合理支持房地产业平稳发展的政策视为对房地产调控的放松，又不能把对房地产企业的帮扶政策演变为新一轮的房地产刺激工具。如此才能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4.4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

政府应充分发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作用。要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实行有力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同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稳定发展，维护国际外汇市场稳定。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保障国际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充分发挥如G20此类组织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的作用以及IMF此类组织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作用，积极利用多边、区域和双边渠道，进一步加强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各国中央银行的沟通交流。

4.5防止“逆全球化”

要预防疫情后极有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重塑中国的国际价值链。随着各国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全面防止疫情扩散，某些国家开始反思过去全球化的副作用，并着手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建设新的供应链或重建本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因缺乏比较优势而衰落的产业。这些举措将会改变产品内部分工的格局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影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此时，中国应该以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联系，适度化解逆全球化危机。同时，中国应争取尽早落实中日韩自贸协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冲目前的逆全球化趋势，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到我国。

5.结语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只有中国人民直面挑战，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维护和用好中国发展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的难关才能闯过。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但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会动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495

[2]李艳军,华民.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模式与宏观调控效果——基于央地关系视角[J].财经智库,2018,3(05):25-39+139-140.

[3]刘贵生,高士成.我国财政支出调控效果的实证分析——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分析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3(03):58-72.

[4]孙立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中国宏观政策反应效果研究——基于开放经济DSGE-VAR模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35-45.

[5]王新霞,黄显林,何旭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24):125-128.

1. 百度疫情实时数据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tab4 [↑](#footnote-ref-1)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 [↑](#footnote-ref-2)
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une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footnote-ref-3)
4. 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footnote-ref-4)
5. 国家统计局，季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B01 [↑](#footnote-ref-5)
6. 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footnote-ref-6)
7. 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footnote-ref-7)